

永不轻松的“任重道远”

《离骚》中最让人觉得是圣贤之言的 也许非“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莫属 比之当代的“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其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是多了一些 因为屈原没有意识到前途肯定是光明的 他上下而求索 或得光明 或坠入黑暗 ;不如今之人们高瞻远瞩 永远能看到光明 心里亮堂。屈原的一生 哀民生之多艰 忧君王之暗昧 真是因受苦受难而伟大 几千年以来 理论家批评家把翻案文章做尽 也没有人敢对屈原不敬 实在是因为不敢不敬重他那任重道远的殉道者的伟大一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里提出的“任”是天下之任 君子之任 自然不能说不重 路途漫漫 一直到生命终结 根本不存在什么“阶段性胜利”因此不能说不远。以一家一姓为己任 就无所谓“重”即使不堪负荷 也可以随时歇挑子的。然古之君子不取 偏要任重道远 死而后已。这是以国事为家事 以天下事为己任 这就是中国式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后世骂孔夫子，有些话骂得真够得上狗血淋头；后世捧孔夫子 也能把他捧得如神明。是荣是辱 孔夫子是不关心了 但我们今天的确很难想象 中国没有孔夫子会是什么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是孔子的一生 过得何其艰难 后世人之所以敢对他老人家指手画脚 是因为他不像某些人那样惯于使用瞒骗战术 连

自身的经历也讳莫如深)而是坦荡地把自己的一生所思无保留地留给后人。在这种坦荡的展示中,我们看到伟大人物的胸襟,看到了实践家极不轻松的一生。如以成败论英雄,以“动机效果一致论”他们的人生目的都没达到。在中国,“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才算是英雄;“马上得天下,折冲樽俎”,“不战而屈人之兵”才算是英雄。思想家忧患的一生,大多耗在与统治者的折腾上,故谈不上是什么功业,又因为他始终在思想,所以他们永无轻松的时候。

通常以为庄子是最潇洒的,其实他也并不如他自诩的那样洒脱。他既不愿“巾笥而藏之庙堂”(《庄子·秋水》)那就应当彻底地混完一生,何必要孜孜矻矻地写下那洋洋洒洒的几十篇大文呢?以他居陋巷,“瓮粟于人,破衣烂鞋”的生活水平而去当思想家,这一生又怎能轻松得了呢?

战国时代,对有文化的人来说,可能是最不轻松的时代。识字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定小到了极点,于是天下的事全要压在这一点小部分的肩上。而到了汉唐之后,地主阶级发展壮大,才逐渐出现了悠闲的生活方式。看《三国演义》刘备南阳寻访诸葛亮一段,让人看到群雄混战之际,竟还有那样的人间桃源。但是原来一身轻松的诸葛亮被刘备请出,便任重道远,鞠躬尽瘁。他那一身轻松的闲居之日,修炼出来的智慧,便在“兴复汉室”的“任”下使他永不轻松了。

就能人来说,即使真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恐怕也没有人敢像唐宋元明清的逍遥派那样恣情山水,偃仰啸歌。他们视焚膏继晷事必躬亲为己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为头颅而为事业。曹植虽不得重用,吃穿不愁,日子过得应当说是不错的,但却觉得无聊,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十六首》)。中国的历史要是没有少数人的永不轻松,恐怕根本就没有光明可言,也许还不知道要在曲折的道路上再摸索徘徊多少年。近代如孙中山,真是一天安逸的日子也不曾有过。辛亥的前十年,辛亥的后十年,他的忧患与所

经历过的艰险 真可以说非人世所堪。

任重道远 成功与否 却不得而知 因此前驱就少 做了路人的居多。但前驱并不需要路人以壮声势，倒是后来者需要多一点的人走在前面把路踩得平坦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驱难能可贵，而能与前驱当上一程同路人也该是贡献。中国人也有正义的冲动 在正义冲动下 也能与开拓者同路奋斗一番 同路可长可短 贡献总是有一点的。同路也可得利益，而当开拓遇到险阻，路人四散 开拓者义无反顾 冒死前驱 踩出一条血路后 人们尊他们为圣贤 是因为他们知难行难 寂寞孤独。

任重道远 固然需要有人呐喊助威 然而呐喊鼓噪能得路人追随一程倒还有用 最要命的是不但不呐喊 而且成看客 看客也罢，更让前驱悲伤的也许是见看客投机有好处，就“入股前进”没有好处，就掀起反旗拆台。中国任重道远的前驱者总是不得不停下来挡背后的冷箭，所以圣贤的胸前背后都会有着累累的伤疤。

有人说 在中国搞改革的都难有“好下场”这当然是愤懑之言。思想的前驱本来的任务就是用血肉之躯筑路，让后来的人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 如果视此为不好的“下场”那倒是本分 有人保驾 有人抬轿 安然地踩着别人的头颅走向“好下场”的 不是皇帝 就是政客。

先忧者的命运

历史上举凡被杀头的思想家，大多都是先于皇帝或专制势力看到了世界的“忧”。这种难得的慧眼，本当是世界的幸福。然而谁先明白过来，谁先醒过来，谁先说国王的“新装”其实是赤身裸体，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专制的板斧就得落在他的脖子上。所以，不经世事的书呆子总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可以申请专利、得发现权、发明权一类的美事，其实大谬不然也。能“先忧”，先要有勇气，有责任感，不怕贬官掉脑袋，不怕给自己添烦恼。

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眼力。社会从来就不缺有责任感的人，但有责任感未必就“忧”得起来。因此可以说从来就多乱卖力气的笨蛋和不肯出力的聪明人。既要有责任感，还得有点真功夫，这“忧”才是有价值的。最简单的例子是“曲突徙薪”。忧者见火灾，不免热情地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如果他看了不说，或者拿不定主意，最后只能与救火者一同焦头烂额。这些，都不足为智者。这个故事略有欠缺的是：当火终于烧起来的时候，这个建议“曲突徙薪”的人物是在观火呢，还是暂时不指责笨蛋，先加入救火者的队伍，共同焦头烂额呢？照时下中国社会的观念，是不准光说不干。当群众行动起来时，不得在一旁败坏情绪。也就是说，既要有先“忧”的勇气，而在忧患已成时，仁人志士也不能只做旁观的预见家，而还得勉力做赴汤蹈火的实干家，否则就要被当成没有诚意、没有同情心的不负责的异类。这种过高的要求，便使中国社会出现了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的人生态度，即使看到了危险也不必出声，久而久之，说了也白说，白说就不说，不说就不忧，大家都快活。更何况原本就怕你比他聪明的人物，能让你比他有眼力吗？袁绍南下攻许都，田丰看到曹操非等闲之辈，劝袁绍以逸待劳，袁绍不听，田丰一再劝谏，袁绍便把这位硬要“先忧”的人关进大牢。袁绍兵败，人们以为他从此要把小神仙一般料事如神的田丰奉为上宾，田丰倒是看得又比凡人远一点，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今天要替田丰扼腕叹惜的人，一定会奇怪，这种走一步看十步的人为何没能看透袁绍竖子不足与谋呢？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先忧”者们以身殉道的传统，他们为自己的职责而活，他们为自己的人格光荣而活，这种冲动执著不是为了显示或证明自己的智慧，而是为了证明世事发展的规律。孔子是先忧者，屈原是先忧者，贾谊、晁错是先忧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是先忧者，孙中山是先忧者……他们都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人们面前表现出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发出了与社会不和谐的声音，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全都言中了。

中国社会有一种很怪的“鸡叫论”，认为鸡应当应时而啼，否则就不是好鸡。三更鸡叫，二点九更便叫是逞能，三点一更才叫是偷懒，都有被杀了清炖或是红烧的危险。即使有人撬锁挖洞，黄鼠狼光临，地震火警，这鸡都应当自觉地闭口，以等三更正点。这种混帐哲学的盛行，就逐渐养成了中国人的“国事管他娘”的坏毛病；这种专制重压下造就的，只能是愚蠢怯懦的“守本分”的国民性格。中国早先的茶馆里贴的“莫谈国是”，是要把臣民起码的政治热情也要镇压下去。等到洋鬼子把大炮架到宫廷的大门口，他才怪自己受了奸人的蒙蔽。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发现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同时也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享乐主义者。既先于天下人而忧国事，自然也就“乐”不起来。凡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都是有“忘忧”的

能力的。人能醉生梦死 亡国惊不动他 为奴为仆惊不动他 人生如猪狗之生 不必知荣知辱 不必论是论非 这还有什么可‘忧’的？宋代文人 有人藉诗词以明忧国忧民之志 也有人以醉生梦死的玩乐为能事 两类作品在中国都有读者 是以可知人生态度绝不可以随便地由圣人来规划一律。中国的智者常劝人们要“活得潇洒”，这种用心当然不坏，尤其是在人人都爱喊累的年月。前数年竟有一支叫作《潇洒走一回》的歌 风靡一国 真是最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玩乐的人生态度。

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怎么愿意看到的，就是天下人为庙堂里的他而忧。

穷则独善其身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何以那样知名？原因并不复杂。一是他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独此一份，其他大家都没能说得如此真诚；二是由于古代中国吏治腐败，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在官吏中献身的人少、“分红”的人多的情况下，杜甫的崇高便如旷漠之高塔，长夜之明灯。即使在今天，面对那些向老百姓侈谈主义理想而私下求田问舍的言善行伪之徒，人们常常就要想起伟大的杜甫。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暂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先完善个人修养。这种观念，可能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国粹，即使是在我们视作金钱世界的西方，也会被作为通常的人生准则。但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的抱负，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为官之后，也会不满案牍劳形，如“师爷”队伍中就出过投笔从戎的班超——一流的人物。想干大事的人太多，人生却又没有那样的顺遂，儒家的“修身”思想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不能显达，施其经天纬地之才，便敛财搜刮，沉湎声色，营造自己的安乐世界，这样的人，果真让他“达”，他就会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安乐窝，何“济”之有？因此，“独善其身”志在兼济”的人生观的积极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毕竟“达”者少，“穷”者多。政治家、思想家批判“独善其身”为消极，然则压制人才的阶级何以总是不能公正地给予其“达”的途途呢？

官场的黑暗，老百姓总是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官场中很少有‘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的人物，问题倒未必是环境成了染缸，而是“穷”时未能“独善”，“达”时便不曾“兼济”，更不会“济公”，而只会“济私”。

由于“穷”时便不能独善其身，“达”时也就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李肇《国史补》中有一则颇为知名的故事。

裴佶常话少时，姑父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姑母，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父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纒千匹。

他对崔昭开骂口的时候，我们以为他至少是独善其身的、不肯合流者，及至看到他的嘴脸为之一变，我们才看清他的‘底功’等于零。

又如而今的腐败之风，人人切齿痛恨，痛恨之余，照样‘利益均沾’。骂过公款吃喝，遇有公款吃喝的机会；“不吃白不吃”；刚刚抨击过公款玩乐，就有了让他公款进夜总会逍遥的机会，他拒绝了吗？形形色色的用公款吃喝玩乐，不但公开化，而且合法化，电视新闻中各类会议的报道，那地点常常不是在会议厅和礼堂，而是在酒店饭庄，不知书不知礼的官僚坦然知‘独善’与‘兼济’的学界名流和文化卫士也坦然，大家一同坐在圆桌大菜前。“下面他们将要干什么？”如果有独善者想‘兼济’一下，问上这么一句，那岂不是太不知趣了？倘他再有点杜甫气，临举杯而思天下饥民，声言宁愿自己饿死而不忍下咽，袞袞诸公果真能从善如流，停杯投箸不能下咽？——杜甫所以伟大，也在于杜甫太少。

有腐败以来，思想单纯正统的人们最看不懂的一件事，就是不

解何以有人做了高官却不肯爱惜自己的名声，而要做贪污受贿一类苟且到极点的事。有些人按民间的说法已经算是“显达”了，正可以干点大事业，照说此时对钱可以不屑一顾了，何以他们却能那样利令智昏，无耻到那种地步？（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把为官廉否看得比“政治路线”还要重要的原因之一。我无数次地听到人们在议论贪官时，大惑不解地问：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想无论那些贪官们如何解释，我们也无法去理解。也许他们在“穷”时也“独善”过自己，“独善”的目的是为了搭梯子，一旦显达，他就要为自己先前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向社会收取巨额利息了。抑或他原来就是贪赃之徒，从来就没有清白过。

政治家、思想家贬损杜甫时，是把他当作不良人生哲学的影子来打的。他为民请命，他的诗歌流淌着人民的苦难，启迪大众的共富贵意识，这当然是不讨好的。他在“穷”时，不仅能独善其身，而且抛却了自己的痛苦和郁伤，更多地考虑天下人，考虑到国家的命运，这自然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要高出一个层次，这也是他不只是在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平民社会享有崇高的文化地位的主要原因。

“穷则独善其身”不一定都能达到杜甫的那种积善成德境界。中国人那种不能成为经天纬地之才，便“起码要做个好人”，的意识极浓厚。“好人”的内涵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利他”，行事处世，能考虑他人的利益，这是中国人对别人的最现实最具体的要求，也是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这种“好人”意识，大概太符合儒家的“仁”的准则，所以在政治家思想家那儿仍是“低层次”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改变这种选择，无论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来折腾，“先做个好人”在平民百姓都里仍然是永久的真理。

“匹夫有责”的新生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的话。然而这个道理 则是有国有天下的那个年代就存在了。

公元前 684 年 齐攻鲁，曹刿请见 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 遂入见”。乡人的观点，认为国家的事该由高官厚禄天天能吃上肉的人去操劳，既得利益，也应得责任；而不在其位，也不应谋其政。曹刿似乎有点答非所问 而只是说天天吃肉的人没用 吃苦拼命的事 只有他才能干好。曹刿战胜 成了好汉 他的‘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则成了名言。

中国的百姓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这是由于“国泰才能民安”思想的熏育。常言说“大锅里有肉 小锅里有饭”为了自己不受饥寒，他便希望官家的锦衣玉食能有保障。一旦外患内乱天灾人祸相加 在皇帝 不过是假惺惺地吞下一两只蝗虫，下一道不关痛痒的所谓“罪己诏”而在小民 则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 或是过“易子而咬其骨”的悲惨生活 或是横尸沙场 死于非命。所以小民想圣明天子 祈盼社会安定 政治清明 而非心怀魏阙 都想去造反 做个皇帝玩玩。《子产不毁乡校》中提到的乡校 就是个自由民讥评时政的场所。旧时遍布中国市镇的茶馆 多贴有“莫谈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也正说明中国匹夫们的政治责任感是太强了。

岳飞跪在其母面前受刺“精忠报国”时 虽然矮下去一公尺 身

上的浩气倒未曾少去一分；而他要报的那个“国”倒不一定爱他，因为他报的那个“国”实际上不过是赵家一姓而已。所以他的一片忠心被昏君奸佞肆意践踏。到了风波亭后他仍是“执迷不悟”。这也就成了后世皇帝宣讲“精忠”的绝好教材。文天祥为挽救没落的王朝出生入死，“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同样，封建皇帝也都旌表起他的忠节。其实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天下多是亡得差不多了，正需要侠义之士去抛脑袋，而他“兴”的时候，是绝不愿意让人“有责”的。你要是喊“匹夫有责”，倒显得你有点不知趣，心怀不轨。因为那“兴”是再也不能归功于匹夫的，只能是“我皇圣明”。你想“有责”一下，官府一定会觉得你在多事。直到1935年的“12·9”，学生喊：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警察却奇怪：这些学生怎么不去读书，要瞎操心？但如果人家的马蹄踏进边关，政变的呐喊嘶吼于宫墙了，这时候有人就希望匹夫出来帮忙。匹夫在皇朝兴盛的时候去“有责”，这在过去就是“问鼎”，就是不臣，就是造反。所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训诫，就是对着清平世界的匹夫说的。

民族矛盾上升时期，匹夫的“有责”客观上看，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确实是伟大，不容否认。但是在专制时代，匹夫的参与意识，却常常地成为政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斗的牺牲品。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中国也曾一样。

《水浒》71回中，宋江让铁叫子乐和唱他作词的“招安歌”。末句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很有点盼望“落实政策”的意思。按说有了水泊梁山，有了百多位头领，宋江即使没能力“替天行道”，也该过过独立王国的瘾。然而他偏要受招安，要当忠义救国军。私下里想的，是要“转正”。宋江要受招安的理由之一，也是那个“匹夫有责”。有什么“责”呢？——打方腊。当他提出这一主张时，遭到李逵、武松的反对。李逵骂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气得宋江要杀他。武松说宋江：“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弟

兄们的心!李逵、武松诸人对宋江爱得太深了,因为爱得深,就替他打算,想要保住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集体主义,其情绪都不免过于热烈了一些。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从利益上看,也“有份”,他们把宋江的决策和自身利益绑到了一起,所以特别地投入。

鲁智深就不大一样,他对朝廷的认识是“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干净!”他根本不相信朝廷有清白的时候。《红楼梦》中柳湘莲说贾府只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鲁智深比他还要彻底。他提出,如果要接受招安,“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趋罢”,公开鼓吹“散伙”。应当说,真正威胁了宋江招安计划的,就是鲁智深的“散伙”。同样是反对招安,李逵粗莽,武松侠义,都是不大动脑子的。而鲁智深冷峻,故我断言,宋江内心是极不喜欢他的。

鲁智深主张“散伙”,是因为他看透了宋江的内心世界,他知道宋江主意已定,要他不做招安梦是不可能的;他可能也从宋江要杀李逵的那种愤怒中看透了宋江的为人,他根本就不指望宋江回心转意,因而犯不着去维护梁山泊的被人利用了“团结”,“散伙”的主张,只针对宋江一人。梁山泊即使全完,那“责”也是赖不到鲁智深头上的,朝廷的腐败及内乱外祸,鲁智深又有什么“责”?

鲁智深在觉察到宋江的政治堕落,而负责任的批评不起作用时,提出散伙,是出于对当权派的不信任,人们是不能责怪他的自由主义的。宋江的那个招安计划,不是强奸民意又是什么呢?对这种人,“帮助”、“教育”、“挽救”都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抛弃他。他生了疮,凭什么要大家都来贴膏药,他得了梅毒,为什么还要强握人家的手,他腐化堕落,干嘛要老百姓为之“痛心”?因此,鲁智深在众好汉中,实在是最清醒的一人,虽然他最终没能以清醒的少数说服不清醒的多数。鲁智深上不了正史,正史上也找不到他那样的人物,钦定的“阳刚”都烙上了家族的印铃,一如牧主的牛马,虽能奔驰千里,能负重万钧,毕竟听命于主人的鞭子。鲁智深

比之岳武穆 就少了那么一个印铃 缰绳套不上去 这才无羁无绊，做成了豪杰。

今天的中国人 经历过“文化革命”这种政治闹剧后，“有责”的意识仍旧不减 希望出政治伟人的愿望仍旧没变 希望国泰民安的愿望也没有变 这还是因为那“大锅里有肉 小锅里有饭”的朴素意识没变。你要是问老百姓为什么富裕了，他会说“还是政策好”；你要问他有什么顾虑，他会说“就怕政策变”。可以说 这种心态有古老的血液 然而中国人“匹夫有责”的心态 也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健康 因为时代毕竟进步了。

雨中的傻子

人走在路上 天上忽然下雨 此时大致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快跑，以自己的奋进少遭雨淋之苦；一种是等待，就近找个地方避雨 第三种人则若无其事 行走如常。

快跑者 决然果断 敢于拼搏 或是因为觉得别无出路 既等不起 就不能不奋力疾跑 再有可能 就是以这种雨中狂跑为人生的一种能量释放，感到无上的快意。虽然有可能于狂奔中不留神跌得头破血流，但这是最有悲剧英雄模样的。然而要是论不幸的可能 那最惨的莫过于就是当他狂奔到家之时 暴雨立歇 仿佛就是老天为了侍候他而特地下的“专场”。这狂奔而吃了苦头的人，人们会把他们叫作傻子。

等待者 通常是出于避免损失。跑不动的 自是没有同大雨拼搏的本钱 跑得动而不肯跑的 则是避其锋芒 认为犯不着与大雨拼命，寄希望于老天也得喘口气休息一下，雨水总有停止的时候。最佳的等待者 连翘首观望也不屑 此时他可以在心里想自己愉快的事：想给娇妻爱子一份幸福；想美元与人民币的积累；想明年当上处长 乘公家轿车用不着自己买伞 想考试与功课 心里默诵“托福”……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他的“狂想欣快活动”暂时停止，他得为生计而立即付诸行动。等待者唯一的 不幸，是雨神不知檐下避者为谁，纵情浪漫地连下七八个小时。如果等待者此时还能默默地在内心构画自己的蓝图 而不心急火燎地东张西望 那真够

得上是最佳的等待者了。

至于在雨中若无其事行走的人 在通常情况下 中国人一律地都把他们当作呆子。

然而可悲的也就在这一点上，因为他完全可能是最能“忘我”的高士。比之狂奔到家而骤雨立歇的斗士，缓行者是幸运的；比之苦等七八小时而不愿行动的观望者，缓行者也是幸运的；但是人们却要把他们视作“呆子”！可能有过一个呆子曾对人说过：“你跑什么？前面不也在下雨吗？”也可能这个呆子曾对等待者说过：“你等着吧 这雨是不会停的。”

也许这是个拙劣的比喻。因为中国人关于呆子的观点，从来就是极不统一的。

人们爱把滑头鬼、既得利益者、稳坐钓鱼台的人称作“聪明人”而常把“心中只有别人 而唯独没有他自己”的贤人称作“呆子”。按这个逻辑 出力流汗的全是呆子 坐享其成的人全是聪明人 孜孜以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全是呆子 八面玲珑、混世玩世的全是聪明人。——按这个逻辑 孔子、孟子、墨子全是呆子，庄子半呆 桀纣不算是聪明人 但是合算 诸葛亮的“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是呆话 姜维比他还要呆；从商鞅到王安石 举凡历史上一切不愿守旧 要找事做的人 无一不是雨中奔跑的呆子 无一不是雨中行走如常的呆子。当代还有雷锋者，万众景仰（全是真心的），但是鲜有从之者 因为他吃亏太多。他活着时曾说 有人说我是傻子，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聪明的傻子。在中国能想通这句话的人不多 曲高和寡 所以至今仍得学雷锋 并使他成为 20 世纪中国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被现实社会认为是“呆子”的人 后来大多被认为是会有功于社会、有功于历史的人物。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一流人物 他们站得高 看得深远 把

凡人不敢做的事做出来了 凡人反而要把他们当作‘呆子’。在河曲智叟眼中 愚公是标准‘呆子’ 在渔父眼中 屈原是想不开的‘呆子’ 在袁世凯眼中 谭嗣同是不要命的、吃力不讨好的‘呆子’ 孙文是不知为自己打算的‘呆子’ 蔡锷是不识时务的‘呆子’……但是后来人看袁世凯，好像也没什么人认为他是聪明人。

凡人不懂‘呆子’们的快乐 只会看他们身上的伤疤和泥水。

比起雨中奔跑的‘呆子’ 雨中缓行的‘呆子’反而显得平和 甚至还有几分稳健 他仍旧是一步 70 厘米，他仍旧看准了脚下的路，他心里仍旧计算着到达的距离，也许他一刻也没停止过美妙的幻想，他不用耽心跌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他就这么安静地走着 不知不觉雨已经停了 他开始做他计划好的事 而医院里或许正在抢救因狂跑而受伤的人。

这种‘呆子’真是少极了。他们的内心 何尝不想走得快一些？他们的内心 何尝不想有同行者 他们知道狂奔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而等待则无济于事 于是他们寂寞地行走如常。

等待者总以为自己最聪明。但中国的事常常就是在等待者的聪明中被耽误了。他们愿意容忍，有耐心，总认为老天是公平的，不会久久地用雨来浸泡明智的人 所以他们嘲笑奔跑者的狂热 可怜缓行者的糊涂 最后等待出了一个以“忍”为智慧的习惯。这种忍耐也真了不起，他们能把社会忍到腐烂，他们能把冰山忍到融化。唐代宗时 元载是有名的奸人 元载看李泌不顺眼 要代宗驱逐李泌。唐代宗心里一清二楚 但他不肯立即下令除元载 反倒是真的让李泌‘下放’。直到元载寿终正寝 他才召李泌回来 说：“好不容易 八年才赶走这个贼”，——他就是这样一直等待到雨停的。

“呆子”不呆 不‘呆’是呆。

“奉献”种种

有几位青年对我说：“我们真心盼望祖国的经济发展能再快一些，祖国富强了，我们在海外就可以挺直腰杆，不遭人家白眼。”这一类的话，每年都能听到不少次，从报纸上，从电视上，也从匆匆回国又匆匆出国的朋友口中。我在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的同时，也有点小小的疑惑。

祖国富强的目的，我看主要还是为了 12 亿儿女的幸福，不仅仅只是为了海外儿女“能挺直腰杆，不遭人白眼”。二是青年们出国“挺腰杆”去了，建设国家的重任倒交给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去承担，这说得过去吗？因而我对这些青年说：人家向你们白眼，许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不努力，对不起你们了。

“粗菜淡饭些许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这是林则徐的老父用以嘱他的一幅对子。对心中只有“我”的青年，这幅对子大概是要倒过来看了。但是如今批评青年，是要有点胆子的，我也只敢把话说到这里打住。

说这样的事也是无奈。说穿了，会伤一些人的心，不点破，就会让更多的人迷惑。我们在一生中所做的事，在我们自己，不过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是大到为理想奋不顾身，小到为自身温饱而作的努力，却常常要被当作“奉献”。向国家民族奉献，天经地义，可惜的是大众的汗水常常要成为少数人加爵的“奉献”。古有“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样的“总结”，固然“枯”的每一根白骨原本也